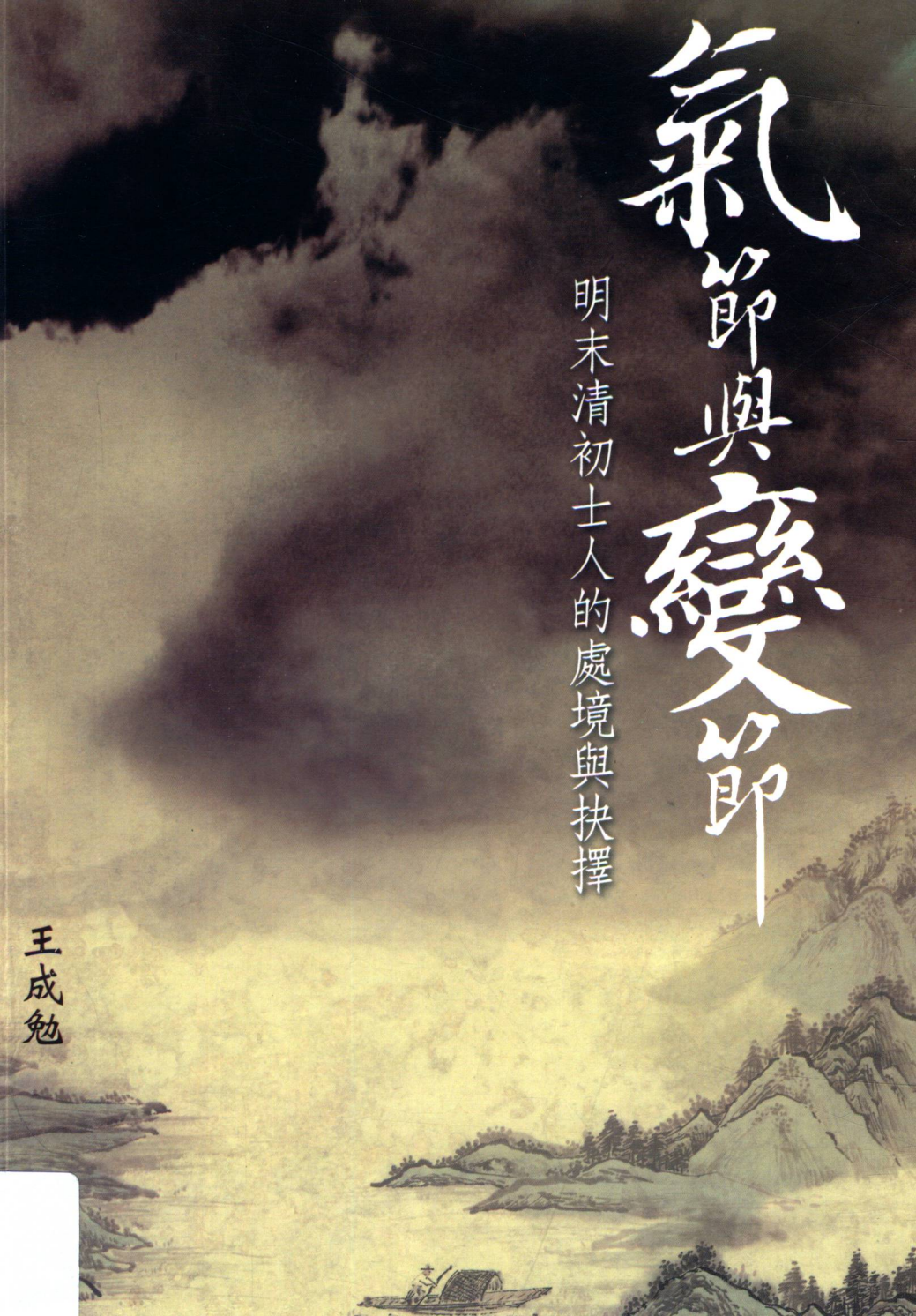


氣節與變節

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王成勉



氣節與變節

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王成勉

2012年3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 王成勉著.

--初版.--臺北市：黎明文化，2012. 03〔民101〕

面：公分

ISBN 978-957-16-0822-8（平裝）

1.知識分子 2.明清史

546.1135

101003923

圖書目錄：

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作者 ◎ 王成勉著
董事長 ◎ 李銘藤
發行人 ◎ 首庠生
總經理 ◎ 陳兆玠
總編輯 ◎ 陳兆玠
執行編輯 ◎ 吳昭平
校對 ◎ 王成勉、吳昭平
美編設計 ◎ 果實文化設計公司

出版者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3樓
電話：（02）2382-0613

發行組 ◎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482巷19號
電話：（02）2225-224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
電話：（02）2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公司網址 ◎ <http://www.limingco.com.tw>

法律顧問 ◎ 梁治律師

印刷者 ◎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12年3月初版

定價 ◎ 新台幣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倒裝、破損，請寄回換書

ISBN：978-957-16-0822-8（平裝）

自序

這是一本遲到的書。二十多年前就想介紹一些明清轉接時期的見解給學界，但是卻一再蹉跎。而今出版，已經到了可以屈指數算退休年紀的時候。

三十年前，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我開始進行明清轉接時期的研究。當時學術的主流風氣，仍然是以高風亮節的角度來描述抗清的士人，更強調遺民不仕的氣節。而我研究的對象卻是被當作貳臣之首的洪承疇。因為洪承疇的降清，坊間對他只有嘲諷辱罵，很少人會注意到洪承疇的一生其實是典型的公僕，無論仕明或是仕清，他都是不居功、不誇耀，凡事殫精竭慮，努力以赴。而在研究中也發現，不仕的遺民中，也未必都是純全守節之輩。當時以價值取向的寫作，讓歷史人物失真，作品更缺少內心的刻劃。所以一直希望能將自己的見解與國外一些相關傑出研究，介紹給國內學界。

實在很難解釋為何在二十多年前就構想出版的這本書，會拖延如此之久，才得問市？一方面是這些年來，在明清轉接時期的研究不斷推陳出新，屢有佳作，實在是難以概論。另外一方面，當然也是自己的疏懶，這項出書計畫不斷為會議、教學、行政與其他研究所打斷。過去有好幾位年輕朋友對此書稿予以協助與鼓勵，特別是史曜菴與徐一智兩位，協助文稿的編輯與校對。但是一直到他們後來另有高就，我還沒有把文稿整理完全。直到去年起，才委託陳世榮博士再次整理稿件，完成最後的校排。

這本書中的文章分為三類，第一類「史論」，是我對於學界有關明清之際研究的回顧與論述。很多在此方面的研究，都是著眼於手邊的個案史料，缺乏宏觀與比較的視野。我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論述此領域學界的研究趨勢與特色，也指出一些缺失和問題，可以作為後來者之參考，所以我收入了六篇文章。第二類「人物」，則是對於當時人物的研究，我特別以張岱和洪承疇為對象，因為他們似乎是兩個極端的人物，被視為遺民與貳臣的代表。可是細看兩人，卻是別有意境，有過去學界所未注意到的地方。另外兩篇文章則是討論明清之交遺民的交往與遭遇。第三類「滿人的聲音」，則是從滿人的角度來看這段時期，因為滿人的統治策略與漢化程度，也深深影響到明末清初知識份子出處的考量。此部份是由四篇文章所組成，前兩篇探究清太祖與多爾袞對漢人的統御之術，後兩篇則從文化與族群政策上來討論滿人的措施。全書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未曾刊登過，而一些舊作也稍加增訂。

這本書中有一小部分是譯稿，如〈清代總督和巡撫的族群成分之分析〉，其初稿係由林澤富、韓聖和、吳欽錫、張心愷等人所譯。他們是我在淡江大學歷史系任教時的學生。當時為鼓勵學生閱讀英文著作，故將此篇英文著作交由他們翻譯。而後我轉往中正大學任教，也鼓勵研究生閱讀英文著作。此時先後有〈明人看明代的衰亡——「十七世紀危機」中國觀點的比較研究〉（初稿係由邱炫煜所翻譯）、〈清初遺民的選擇〉（初稿則是由吳昆財所翻譯）。我對這些初稿都盡力修改。事實上我為這些文稿修正與潤色的時間與心力，遠比我自已翻譯還要辛苦。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良好的英文著作，另外一方面，也在增進他們英文的閱讀能力。現在他們都有很好的工作發展。至於〈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一文，則是我轉至中央大學任教時所翻譯的。

其實我翻譯了更多的文稿，但是也怪自己不夠積極，有些外文的著作，雖然早就翻譯出來，但拖到我去爭取授權時，有兩位作者已經過世，無法獲得授權，那些已完稿的譯作也無法面世。而當年我與國外作者聯繫洽談翻譯時，都得到他們熱烈的回應，可是因為沒有及時的進行出版工作，一直感到愧對他們的盛情。

特別要提的是，雖然這些被翻譯作品多半為早期的文章，但都是很有份量的重要著作，也都是值得學界注意的佳作。例如，〈貳臣論〉是岡本教授在三十多年前的著作，這篇文章譯文長達五萬多字，可以說是第一篇檢討清初貳臣的文章。她能夠那麼早提出宏觀的視野，注意到貳臣的角色與地位，有很大的貢獻。三十多年來，國內外學界少有人注意到這篇文章，所以我特別把這篇譯文收在這本書中。由於我的日文已經退化，還好這篇譯文先後經過徐一智與陳世榮兩位博士加以校改，在此一併致謝。而艾維泗（William S. Atwell）的文章〈明人看明代的衰亡——「十七世紀危機」中國觀點的比較研究〉是一篇得獎的作品，宏觀的比較鄂圖曼帝國、西班牙帝國與明帝國衰亡時知識份子的反應，可惜國內既無人注意，更無此類的著作，所以特別翻譯列入。

三十年來對於這個階段的研究好像有些孤單，但是又先後得到很多幫助，也無法一一列名感謝。但是對於家人的支持，還是應該一提，感謝內子宜涯與兩位孩子家君、家康，容許我過去長期的埋首書房，沈浸在三四百年前的歷史中，希望他們也能夠和我一樣，欣慰看到此書告一段落。

王成勉 於中央大學

2012.2.29

氣節與變節

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自序

史論

1. 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 1
2. 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 15
3. 清史中的洪承疇 33
4. 危邦亂政難同心——評介《南明史》 49
5. 附錄一：貳臣論 59
6. 附錄二：明人看明代的衰亡——「十七世紀危機」中國觀點的比較研究 111

人物

1. 文史述情衷——張岱的遺民書寫 143
2. 殉義與變節間的餘地——論洪承疇的降清 169
3. 附錄三：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 185
4. 附錄四：清初遺民的選擇 199

滿人的聲音

1. Manchu Strategies of Subversion in the Conquest of China (清太宗招降策略之研究) 225
2. Claiming Dynastic Legitimacy: Q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Dorgon Era (多爾袞的正統策略) 251
3. 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 289
4. 附錄五：清代總督和巡撫的族群成分之分析 307

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

一、前言

在近十五年來，明清轉接時期已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焦點之一。對於此段時期的研究，目前至少已有二十幾篇博士論文，上百篇的學術專著，以及不少的專書與論文集出版。至於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觀點，均走向多元化的發展並有非常深入與突破性的探討，使得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複雜現象能更清楚的呈現出來。

對於明清轉接時期這段時間的界定，現代學者均擴大學術的著眼點，不再把時間侷限於改朝換代或南明的年份上，因此後金成立的 1616 年，改名清朝的 1636 年，以及清入關的 1644 年，均不定為此段時間之起點，而南明永曆帝被害的 1662 年，平定三藩的 1681 年以及平臺的 1683 年也不適合做為此時期的下限。在 1974 年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中，一群研究明清轉接時期的學者在討論中得到共同的認定。他們認為，為全面了解這段從晚明到清的變動過程，應把這個變動的整個時期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時間要上溯到萬曆中期的 1590 年代，然後一直延伸到雍正中期的 1730 年代¹。只有在這一百四十年左右的過程中，才足以看出思想、政治、經濟等各層面在這段時期發展的一致性。

事實上，早一代的漢學家們也有類似擴大著眼點的看法。例如已故的學者謝國楨，在研究此時期的學術文化史時，就曾指出這段時期應是公元十七世紀，即是自明萬曆三十年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1602-1701)²。歐洲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在二十多年前也提出十七世紀在中國思想史上是重要的關鍵時期³。前些

¹ Spence, Jonathan and John Wills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reface xii.

²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2。

³ Balazs Étienne,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時候出版的《萬曆十五年》的黃仁宇，也提出在 1587 年時，中國的政治、社會等方面已有顯著的變化⁴。可見這方面的學者們都有類似的觀點，且都擴大了此一時期的時間界定。

在學者們對此時期的討論中，明末士人對滿清征服中國的反應始終是一個深受注意與討論的主題。明末朝政敗壞，學術思想紊亂，民生困苦，在面臨流寇擾亂與清兵壓境的威脅下，世人對明能否保持忠貞是一個大問題。由於士人受儒家忠君思想影響至深⁵，時值外夷入侵，兼以內政腐敗，是以降清與否，不僅包含了生命上的選擇，也包含了對自己志節、家庭、社會以及國家的看法與責任的考慮。雖然在後來有很多歷史記載和著作上強調此時期士人的忠貞義行，但這些作品多半受到傳統儒家思想所注重的「忠」的觀念的影響，也是受到清朝中期開始強調忠君與貶低貳臣的影響⁶。

在此時期，明末大多數的士人是選擇了降清的做法。但他們為何降清？是否投降代表了對儒家倫理的不忠？對明朝的遺忘？他們是否都是貪生怕死，厚顏無恥的想在新朝混個官位以圖富貴？他們的考慮為何？內心的矛盾與衝突為何？他們所遭遇的環境為何？清朝如何利用這群降人？如何拉攏與監視他們？這些以及其它許多問題，使大批明末士人降清的現象成為一個尚未解開的謎，直到最近才有一些著作開始探討這個過去一直未被學術界所重視的問題。

在過去的研究中，多半側重在士人抗清的行動上，也把反清的士人列為忠貞的明遺民。而這些明遺民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呈現出種種不同的類型，他們對新朝的反應各有不同，他們彼此間對於為明盡忠守節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籠統地以忠貞之士或遺民來含糊的概括他們，似乎也不再合適。他們其中有的積極參與南明朝廷的活動，有的自組義師抗清，有的則歸隱不問世事。但是這些人在眼看清朝江山日趨穩固，他們是如何自處？他們的親朋友好多參加科舉、博學宏詞的甄試，乃至《明史》的編纂，他們的反應又是如何？他們在清的統治下又是何以

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85 年）。

⁵ 安部健夫，〈清朝的華夷思想〉，《人文科學》，第 1 卷第 3 期（1946 年 12 月），頁 150-154。

⁶ 安部健夫，〈清朝的華夷思想〉，頁 150-154；及 Wang Chen-mai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Ch'ing Times: The Case of Hung Ch'eng-ch'ou (1593-1665)",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17 期（1985 年 5 月），頁 450-467。

爲生？當他們的兒女在清朝時出生，他們視自己的兒女爲明人抑或清人？他們對明亡的解釋又是如何？這些有關遺民的問題在近年來被許多國外的學者們提出討論，其中固然有些偏差，但其研究也有許多成果，可供國內學者來參考思索。

二、明遺民的分類與其對清的態度

幾乎所有近代西方的漢學家，在研究古代中國士人之歸隱時，都採用了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的分類模式。⁷牟教授以元朝爲例，認爲在南宋亡後，士人除了出仕元廷，或參加反元活動外，尚有第三種選擇，即是採取隱逸的方式。但是儒家隱逸的情況可以分爲二種：一種爲義務隱逸(compulsory eremitism)，這是指在理學思想中對忠的看法，即是已亡之朝的朝臣有義務爲原朝守節，終身退隱不仕⁸。另一種是自願隱逸(voluntary eremitism)，此種隱逸可溯源自早期的儒家思想，即是士人基於道德的看法，當覺得環境不適合出仕時(多少包括對當時政府或統治者的不滿)，則採隱逸的做法。但是任何隱逸的決定均是來自個人的良知和直覺，並非受到任何必須的責任所驅使。

不過近年來已有學者認爲這樣的分類不夠詳細和完全。例如有些人在明末時已隱居不仕，那在清初時，就不應該把這些隱居之人都列爲忠於明的的隱士；而有些人是因其父爲抗清而亡，遂不肯出來應清的試或出仕滿清政府，這或許是以孝爲先的考慮，也許不能算是忠於明朝的行爲等等說法⁹。

另外一些學者也指出，在探討士人對明朝的忠心時，要注意到他們的年紀。這是以清軍陷北京的 1644 年爲界。在此時間之前即已成年的人，應該算是明人，應爲明盡忠；在此時尚未成年之人，則不需強求其對明朝的忠心；而在 1644 年

⁷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F.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02-240.

⁸ 關於理學中對於「忠」的觀念，可用朱熹的觀點來解釋，即君臣關係就如同父子一樣，是固定而不可更易的。是以臣子對君主必須絕對忠誠，以迄於死。這觀點可見諸劉子健對岳飛的評論。Liu, James T. C., "Yueh Fei (1103-41) and China's Heritage of Loyal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2 (Feb. 1972), pp. 291-97.

⁹ Willard J.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part I & I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 (1968), pp. 114-56 and 29 (1969), pp. 201-247.

以後出生的一輩，則應算是清朝的屬民¹⁰。

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在清兵入關前均已成年，王夫之與黃宗羲均先後投身南明抗清的行動，而顧炎武亦傳聞其曾參與抗清的活動。事實上，這些反清復明的活動可能並沒有給他們留下一些珍貴的回憶。美國學者 Ian McMorran 曾研究王夫之投身南明永曆朝廷抗清的經過。王夫之在永曆朝中日睹黨爭傾軋激烈，他自己亦遭人陷害，幾乎身死，遂毅然離開永曆朝廷，終身隱逸，不再奉召¹¹。這個例子似乎可反映出當時有心於反清之人在南明政爭中所受的挫折。

從另一方面來看，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這三位士人對效忠明朝的看法上未必完全相同。如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認為顧炎武接受其繼母勿事異朝的遺命，故以後一再以此為由，拒事新朝；而其同時也因為母盡孝守制，未參與抗清活動，並婉拒了南明義軍的邀請。可以看出他在面臨忠孝的選擇之時，似乎是以孝為先¹²。

但從顧炎武的交友上，仍可以看出他對明朝盡忠的標準和原則。在年紀較大的一輩中(即在 1644 年時已成年者)，他只與那些隱逸的明朝遺老來往，而對於年青一輩的友朋，則並不在乎他們是否出仕清朝，甚至他的姪兒們身居清朝要職，顧炎武也不在意，甚至與他們同住。因為他們在明亡時並未成年，因此並無為故朝守節之義務。顧炎武的行止原則，則是絕不踏入官府和衙門一步，可能是他覺得一旦如此，則有入清政府之感。

為了反對滿清的統治，顧炎武、王夫之、呂留良等人的作品中都流露著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他們反對、也排斥文化主義的說法，即是滿人逐漸的漢化會有益於中國。王夫之提出了「保類衛羣」的觀念，認為羣為天性，斷不容異族之侵僭，即一切國家，皆當為民族國家，一切異族之政權皆大悖紀羣之義¹³。這種以

¹⁰ 採取這些觀點的論文不少，除上述 Willard J. Peterson 之文外，還有 Chang Chun-shu and Hsueh-lun Chang, "K'ung Shang-jen and His T'ao-Hua Shan: A Dramatist's Reflections on the Ming-Ch'ing Dynast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9.2 (1978), pp. 307-37.

¹¹ Ian McMorran, "The Patriot and the Partisans: Wang Fu-chih's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Yung-li Court," in *From Ming to Ch'ing*, pp. 133-60.

¹² Willard J.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亦參見石錦，〈顧炎武經世思想的界限〉，《史原》，第 3 期（1972 年 9 月），頁 126。

¹³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 年），頁 648。

種族為羣體為出發點的看法，被認為近似於近代西方的民族思想¹⁴。而顧炎武和呂留良則均主張嚴格區別華夷界限，應該互不往來，同時強調對自己種族的忠貞，不事異族王朝¹⁵。

但是這些明朝遺民對纂修《明史》的工作，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似乎認為這是清朝企圖勾引他們變節的手段，但他們雖然拒絕參與，卻又關切紀錄之真實，怕明史為清人所亂，此外，他們可能也想藉《明史》來表達自己對故國最後之忠貞，因此這些人不少曾間接協助《明史》的編纂。例如顧炎武雖拒絕參與纂修，但仍提供意見給負責編修的姪子徐元文及學生潘耒，指示體例上的問題以及應注意那些書籍等事項¹⁶。而黃宗羲則提供自己的藏書給編纂《明史》的人員，同時向徐元文推薦自己的兒子來參與《明史》的編纂¹⁷。

但是黃宗羲這樣協助《明史》的編纂工作並不為其他一些遺民所贊同，如呂留良即採取了批評嘲弄的態度，他以詩來諷刺黃宗羲厚顏無恥的向清叩首，並笑其子由龍變蝌蚪以便將來叫於庭(廷)中¹⁸。值得注意的是呂留良雖採這樣強硬的立場，但他在清兵入關時尚未成年，並且曾經考過清朝的科舉。不過，呂留良如此批評黃宗羲，也可能是牽涉到他們二人之間因為學派見解不同以及為共同買書等事而引起的個人恩怨¹⁹。另外此時期士人隱退不出，並寫史撰文，一面宣洩自己憂國之痛，一面保存歷史真相的作品也相當多，這也是此時筆記小說、歷史記載大盛的原因之一²⁰。

¹⁴ Mi Chu Wiens, "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apers on China*, 21 (1986), p. 15.

¹⁵ Mi Chu Wiens, "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 15; 亦可見石錦之前引文，以及黃秀政，〈顧炎武與清初民族思想的勃興〉，《文史學報》，第8期（1978年），頁83-96。

¹⁶ 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下）〉，《故宮文獻》，第4卷第1期（1972年12月），頁2-3。

¹⁷ Thomas S. Fisher, "Loy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Early C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1 (June 1984), pp. 116-7; 及孫次舟，〈黃梨洲的生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存粹學社，1978年6月），頁11。

¹⁸ Thomas S. Fisher, "Loy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Early Ch'ing," pp. 117-118.

¹⁹ 關於呂留良的一生及其與黃宗羲交往的經過，除上註之文外，亦可見 Thomas S. Fisher, "Accommodation and Loyalism: The Life of Lu Liu-liang," part I-II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5 (Mar. 1976), pp. 97-104; 16 (Sep. 1977), pp. 107-45; and 18 (Sep. 1978), pp. 1-42.

²⁰ 此亂離之際的文人命運，心態與作品，可參見邵紅，〈遺民的心事——論陶笈夢憶一書的性質〉，收錄於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委會編，《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頁913-939。

三、新生一代的反應與心態

在轉接時期成長的一代中，對仕清也有各種不同的作法。如顧炎武的許多姪子、親戚、學生等願入清廷，擔任高官，也有如呂留良、李顥等人排拒滿人的統治，而過著隱逸的生涯。不過呂、李等人雖不入官場，卻仍藉編書、寫作等活動來反映他們的政治態度。

根據近人的研究，呂留良編輯了許多文選，其目的非僅在於營利或學術本身，而是以義理來選文，注意到文章的文字與思想，借用這些文章來宣揚自己的道德哲學與種族觀念²¹。李顥也是採取為明盡忠的立場，他用「道」的觀念來批評滿人。因為傳統的思想是把君主的德性和天命看作互動的因素，如君主有德性、行為好，則天下安定，學問昌明，如果君主無道，則一切大亂。反過來說，如能證明紀綱紊亂，則君主與政府必定不好。所以李顥提出「學問不再昌明」的說法，表示孔子的道德標準已不顯明，也不再為社會大眾所共守，事實上，他即是間接的在批評滿人政府以及抗議滿人的統治。因為滿人失德，乃造成天命混亂的局面²²。這種利用理學或天運的觀念來間接批評時政，可以算是清初文風的一項特色。

至於在明末清初生長的一代，他們是處於一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他們景仰明末英雄與士人的氣節，卻又必須面對已經確立的異族政權；他們對晚明文化不滿，卻又冀得文人之名聲地位；他們苦習詩文，但是當時科舉取官的漢人名額卻少，他們因前途無定而有忿懣不平之感；另一方面他們對清朝的文治(指對康熙時的博學宏詞考試與編纂《明史》等文化活動)與武功(指滿人在軍事上的勇武與組織)又有仰慕與敬佩之心²³。這些交綜錯雜的感覺使得他們產生種種矛盾的心態。

²¹ 蕭公權、錢穆、蕭一山等人的作品中均指出此點。但是 Thomas S. Fisher 的論文則表示他未能從呂留良的著作中清楚的看出這觀點。Thomas S. Fisher, "The Life of Lu Liu-liang (1629-1683), Part III: The Late Years," pp. 14-19.

²² Anne L. Davison, "Li Yung (1627-1705): Protestor from the Province," *Ch'ing-shih wen-t'i*, pp. 8-27 and Leonard, Jane Kate, "Protest and the Ch'ing Intellectual," *Ch'ing-shih wen-t'i*, pp. 1-7.

²³ 當時文人的矛盾心態，以及在此情況下文風的轉變，可見 Lynn A. Struve 的論文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From Ming to Ch'ing*, pp. 321-65.

這一代的文人多半視自己為清朝的子民，能自在的與清官交往，並且大都對作官的機會反應積極。例如在應博學宏詞科時，大多數被徵召的士人都感到與有榮焉。此外編輯《明史》的計畫(此時距清人陷北京已三十五年)，也受到許多士人的支持與參與，而這些士人多是在晚明清初時所生長的一代。

不過，這一代並非完全沒有對明朝的感情包袱。在他們生長的環境中，仍時常接觸到父執輩或是文集、筆記中所敘述明末忠烈抗清的遺事。使得他們雖然在政治上對清效忠，但是這種忠誠又顯得未盡完全。在對前朝懷念與對新朝信心未定的交互影響下，他們在文風上有所改變。把過去文人研究的重點(重要人物、黨派爭論、哲學細節)一轉而為以前所不重視的小人物或英雄人物，以及在歷史上未注意到的時代和軍旅生涯等事蹟。這種現象可以從當時所產生的大批筆記小說中的內容看出。這些筆記小說有許多是在敘述明朝或晚明的人物，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作者利用歷史小說來表達自己的心態，或是用史學作品的形式來自我呈現，如江日昇的《臺灣外紀》和溫睿臨的《南疆釋史》等都是這一類的產物。

張春樹與駱雪倫的研究，也肯定了這批在明清轉接時期出生一代的矛盾心理。例如孔尚任所寫的《桃花扇》便是極好的例子。孔尚任生於 1648 年(清入關後四年)，但他受到轉接時期氣氛與環境的影響，藉戲劇的形式描述南明的悲劇，給新朝及後代提供歷史教訓。《桃花扇》中並未批評清朝或滿人入侵，但是提出了嚴肅的問題：「誰該負南明亡國之責任？」此劇中有對讀書人的指責，也有對一般社會下層人物的推崇，充分反映出明清轉接時代之動盪環境，對人心的巨大衝擊²⁴。

四、對清朝文治的反應

滿清入關後行科舉考試、開博學宏詞科，以及編纂《明史》等工作，吸引了當時士人的注意。至於其政治效用如何，近年的研究則有二種不同的看法。

²⁴ Chang, Chun-shu and Hsueh-lun Chang, "K'ung Shang-jen and His T'ao-Hua Shan: A Dramatist's Reflections on the Ming-Ch'ing Dynastic Transition," pp. 307-37.

第一種看法是博學宏詞的考試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政治效果。因為大多數參加考試的士人均曾在清朝官場中任職過，或是已參加過清朝的科舉考試。因此從吸引忠明之士來清廷任職的觀點來看，這項考試應該是失敗的。根據分析，被推薦來考試的士人，有半數以上曾擔任過清朝官吏，在錄取的五十人中，有二十八人已得過清朝科舉的舉人或進士的功名。而其餘被推薦獲錄取之人，也並非都拒絕在清朝中任官。更有意義的一點，是在參加考試中有五、六人曾獲得明朝的進士或舉人之功名，但他們均未被錄取。因此，這博學宏詞科的政治作用不大，而拒考者如顧炎武等人實居少數。此外，這項考試舉行係在三藩之亂聲勢轉弱之時，其目的或係藉以恢復整個帝國的和平與信心，並非籠絡南明士人²⁵。

但是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博學宏詞的甄試與編纂《明史》兩件事打破了中國士人抗拒滿人統治的心理²⁶。在分析 202 位受薦參加博學宏詞考試的人中，有 152 人應考，錄取的 50 人中，40 人(百分之八十)是來自江、浙兩省。一位美國學者認為，此舉乃是康熙皇帝注意到朝廷內的南北衝突，並為擴大朝廷的參政基礎，因此刻意延攬江南士人參政。當然這也有撫慰江南士人的作用，此舉乃是在爭取當年抗清活動最激烈的地區。而這項考試的另一效果，則是其他漢人官員對這批因特別甄試出身的官員側目相視，甚至稱他們為「野翰林」，因此這項博學宏詞考試轉移了部分中國文人的注意力，把以前對滿人的種族攻擊轉為對其同輩文人的攻擊²⁷。

五、從文化主義來看清人的入主中國

關於當時文人如何看待與解釋滿清的征服與統治，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根據藍德彰(John D. Langlois, Jr.)的研究，清初士人多採文化主義的觀點來看

²⁵ Willard J.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pp. 235-241.

²⁶ 中國方面的學者一直認為清朝崇儒和博學宏詞之試等活動是在籠絡明室遺臣。可見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或呂士朋，〈清代的崇儒與漢化〉，《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

²⁷ Lawrence D. Kessler,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1971), pp. 179-200.

待清朝的入主中國²⁸。即是中國文人企圖從上一次異族(元朝)統治中國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對比或類推的例子。

當時士人從對元朝統治的研究中，發現中國文化在異族統治下仍能繼續發揚。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其地位甚至優於年祚短暫的異族政權。在這種文化主義的觀點下，「外人征服」的陰影消散了；同時他們更進一步發現，在異族統治下，反而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機。如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指出，因為這種(異族統治)時候，政府和法令都比較鬆弛和寬大，學者比較能自由自在的創作偉大的不朽之作。或許是這些文人用元朝的事例來激勵自己在滿人統治下要有較大的成就，或許是他們有使命感，要在異族統治下保存並發揚中國文化，因而造成清初文化主義觀點的盛行。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文化主義的影響，誘使他們產生以「文化的忠」勝過狹義的「政治的忠」的觀念。

另外，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也從文學與文人的角度來解釋十七世紀文人的現象²⁹。他把當時文人分為三類：風流、節制與殉義。他們分別代表在此轉接時期與滿清合作的士人、對明朝保持忠誠的士人，以及在三藩之亂中對清朝守死節的漢族士人。第一類的人有錢謙益、吳偉業等人，他們在平日生活中注重真情的流露與生活的享受，並講究文體的藻麗與沉鬱，他們在清人入主後，採取了投降的立場。第二類是指那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士人，如顧炎武和萬壽祺等人，他們採取隱逸或出家的方式。至於第三類，則可從當時兩部寫實名劇中看出：「續離騷」和「桂林霜」。前者是寫清官范承謨在三藩之亂中，寧死不降三藩，為清盡忠的故事。後者則描寫另一清官馬雄貞，在三藩之亂中，犧牲自己與家人的性命來盡忠清廷。馬雄貞的守節尤其意義，因為其祖父當年是為抗清而殉義，而其孫在六十年後卻為清盡忠，這種轉變代表了天命轉移的確定。作者以為這三類人分別可視為悲嘆過去、忍受現代，和慶幸他們所獻身支持的未來。

²⁸ John D. Langlois,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1980), pp. 355-98.

²⁹ Frederic Jr. Wakeman,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II.4(Aug.1984), p. 99, pp. 631-65.這篇文章是魏斐德過去研究此轉接時期的系列文章之一。後收入由加州大學出版的著作 *A Great Enterpris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六、對降清人物的研究

在稍早的中文著作中，對於在明清轉接時期降清、事清的士人往往採取嚴厲抨擊的態度³⁰。這也是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因為中國的歷史記載往往受到儒家思想中忠之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乾隆年間《貳臣傳》的編寫，更使得在轉接時期降清之人一律被打成不忠不義，大節有虧的「貳臣」，此後不但受盡鄙視，同時在歷史研究上也被漠視，直到近年來才有極少量的相關著作問世³¹。

事實上，在此時期士人降清者為數甚多，如果對他們不加以研究，而以當時少數幾位抗清名士來概論當時士人，則不但在歷史研究上有誤導的現象，也無法解釋清人征服與穩定中國過程的迅速順利。《貳臣傳》共收 119 人，其中進士 59 人，舉人 3 人，共計 62 人，超過總數的一半以上，而這些文人多半不是城陷被降，而是在南明抗清義軍紛起時降清的。但是這些人為何在此重要關頭變節，則仍缺乏論著來探討。

從另一方面來說，降清的許多文人除了對清朝政治極有貢獻，在文學與史學方面，也均佔有一席之地，所以在歷史研究上，亦不可因其人之行為而廢其所學³²。進一步而言，當時降清的士人也包括了各種不同的類型，並不見得人人都慶幸能再做朝官，他們熟習孔學，自然知道自己在別人，甚至在滿人眼中的地位，他們內心也並非一直處之泰然。

在近年的論著中已開始有人研究這批所謂的貳臣，如錢謙益、吳梅村(偉業)、洪承疇等人。錢謙益雖在南明時與奸臣閹黨為伍，在清兵進逼時又率官員投降，但從其詩文與作為中，似乎其內心仍有掙扎的痛苦。如錢謙益費心盡力撰寫《明史》，他自己與友人書中曾記：「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即有事於國史，晚遭喪亂，

³⁰ 採取這種觀點的論著很多，例如，孫甄陶，《清史述論》(臺北：九思，1981 年)；李學智，〈明末之士風與清初之降人——兼論天聰朝臣工奏議〉，收錄於《趙鐵寒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頁 611-649。

³¹ 關於清官方立場對當時史學的影響，可見 Wang Chen-main 前引文。

³² 杜維運，〈錢謙益其人及其史學〉，《書目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1976 年 6 月），頁 41-46。杜氏在文中即指出錢氏在史學之地位與成就的重要，說明錢氏雖道德有虧，然其學則不可廢。

偷生視息，猶不自恕，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³³。」而時人凌鳳翔則明揭錢謙益之寫史心懷：

先生獨傷心捫淚，奮其筆舌，含垢忍恥，輒復苟活，既師契而匠心，不代斲以傷手，俾後之覽者，如登高臺以望雲物，上巢車而撫戰塵，莫不耳目強皇，心胸開拓。顧其實際滄桑，有難察察言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為之鉉解，而闡幽發潛，亦孰知宗伯之詩，可以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其關係重大，有若此也哉³⁴。

錢謙益對明史極為留心，旁徵博引，纂成百卷，雖不知其真正心意為何，但我們卻無法只把他當作一個苟延偷生、僥倖富貴的人物。杜維運即以存疑的口氣來寫錢氏的心態：

於萬曆、天啟、崇禎年間，錢氏名隸東林，領袖清流，未嘗為小人。甲申之後，俄而阿馬、阮矣，俄而迎降清師矣，於是始為士林所不齒。以錢氏垂暮之年，其仍貪戀人間之榮華富貴，聲色犬馬耶？抑另有其他隱情，不得不忍辱含垢人間耶³⁵？

關於錢謙益的生平仍缺少研究，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與評價，實值得史學界做進一步的研究。

另一位頗受注目的人物是吳梅村，他是此時期充滿矛盾之人物的代表。他值此朝代轉接時期，不知何以自處來安身立命，起先既未附和起義反清的忠貞之士，也未效法錢謙益迎降清兵，卻在後來隱居時受清人徵召出仕。但是任官後又逢朝廷南北政爭，最後則悔恨南歸，但已身負貳臣之名。我們可以說他一直生活在悔恨不安之中。他曾寫了不少自懺的詩文，如：

網疏免刑戮，大道全身名；
時命苟不佑，千載無完人。
入山山易淺，飲水水不清；
一身累妻子，舉足皆荊榛。

³³ 杜維運，〈錢謙益其人及其史學〉，頁43。

³⁴ 杜維運，〈錢謙益其人及其史學〉，頁43-44。

³⁵ 杜維運，〈錢謙益其人及其史學〉，頁43。